

適得其反？援助的訊息與內戰*

平思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援助的主要目的在於受贈國的發展，而許多國家發生內戰歸咎於經濟情況不佳，那麼，援助是否可以降低內戰的風險？現今的文獻認為援助是具有戰略性的，也就是必須要考慮援助國以及受贈國的互動，因此援助可視為偏向政府的干預，本文認為這樣的干預會惡化政治不穩定國家中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增加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的成本，同時也降低戰爭成本（war costs），阻礙衝突團體間和平協議的達成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本文使用縱橫資料（time-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以多層次「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當援助越多，內戰爆發的機率反而會上升。

關鍵字：援助、內戰、承諾問題、權力分享、信號

* 作者感謝多位審查人給予的寶貴意見，以及寫作過程中許多學術同僚們的中肯建議。本文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 E-mail: pingsn@gmail.com

收稿日期：107年8月2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2月10日

壹、前言

內戰經常發生在貧窮的國家，因為低落的收入水準是導致內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 Fearon and Laitin, 2003; 平思寧, 2014; 2015）。¹ 世界銀行前行長金墾（Jim Yong Kim）在 2017 年 4 月的演說中更表示，到 2030 年全球一半的窮困人口將會活在衝突的區域內（Kim, 2017），而這樣貧窮的國家更容易吸引來自於國際社會的援助，² 有鑑於這麼多援助投入貧窮的國家，而其中又多前往政治不穩定，或是內戰曾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國家，那麼援助與內戰的關係為何呢？援助是否可以藉由改善受贈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而降低內戰發生的機率？還是對於內戰並沒有壓制的作用反而會助長內戰的爆發？

援助國（donors）通常把遭受內戰的國家放在援助的優先順位（Collier et al., 2003; Ellison, 2016），但援助作為國家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外交干預的一種手段，所以援助國經常會成為介入內部政治不穩定的第三方（third-party）。³ 過去的研究已經否認援助的良善動機，認為這一切都是有關於國家利益的優先以及戰略的考量，而援助並非全然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為首要目的，援助國的國家利益仍是主要考慮，⁴ 畢竟援助還是一種外交工具，

1 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 2018 年公布的 34 個低收入國家中，只有 4 個沒有發生過內戰（貝南、北韓、馬拉威以及坦尚尼亞），其界定低收入國家（low income countries）的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per capita）低於 995 美金，文中所提之 34 個低收入國家請參考世界銀行網頁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總共付出超過 7 兆美金的援助給開發中國家；西方國家也承諾在 1970 年後每年花費 0.7% 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用於貧困國家的建設（Tierney et al., 2011; Findley, 2018）。

3 二戰後超過 6 成的內戰曾被其他國家干預，其中五分之三的國際干預是超過一個以上的國家介入（Saideman, 2002）。

4 例如美國作為援助的大國，冷戰時期的特殊情況以及對於民主制度的推廣的考量，都可能超越了以受贈國家（recipients）經濟情況為主的援助，而至於影響援助成效的條件（例如受贈國家的政治制度、治理以及貪污腐敗情況），也不一定是影響援助的關鍵動機（Fleck

是援助國利用資源想要改變或影響受贈國政策行爲的一種手段，在受贈國家政治不穩定時當然也不例外，甚至成爲一種干預的形式（Balch-Lindsay and Enterline, 2000; Findley, 2018）。

然而，我們很難確認援助國以金錢資助的干預方式的動機爲何，畢竟所有援助的戰略動機都可以包裝在「開發援助」之下。因此本文研究的問題是：援助是否增加內戰的風險？本文認爲，內戰的爆發來自於和平協議的失敗，而達成和平協議透過兩種手段：政策改變以及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然而援助會透過給予政府以及反對勢力「信號」（signal）的方式，凸顯並惡化政策改變中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以及透過影響「戰爭成本」而降低權力分享的機率，進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

本文組織如下，第貳節討論過去的文獻對於援助與內戰的研究，特別是援助對內戰影響的正反面的論述，並敘述本文對內戰與援助研究的貢獻；第參節爲本文主要理論部分：首先，援助無法透過提升經濟表現以及民主化降低國內人民對於現狀的不滿；再者，因爲援助給予的信號所帶來的承諾問題，以及戰爭的成本與效益，援助也無法促成國內不滿勢力與政府和平協商的可能，因此援助將會增加內戰的機率；第肆節本文將以計量經濟學的方式，以雙邊援助作爲援助的代理變數，驗證本文的理論，最後一節是本文的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貳、文獻回顧：援助是否鼓勵了內戰的爆發？

Findley（2018）認爲援助引起內戰的理由可分爲直接的關係與間接的關係。第一是直接的關係。援助會導致內戰爆發在於兩個貪婪的因素：「尋租」以及「掠奪」，當叛軍認爲一旦在衝突中奪得執政權，那麼援助的資源就會爲其所得，衝突是爲了將來可獲得的「獎勵」，這樣貪婪的動機無法透過協議（bargains）達成，因此援助所帶來的尋租與掠奪會使得內戰風險升高（Blatt-

and Kilby, 2010; Harrigan and Wang, 2011; Meernik et al., 1998; Peterson and Scott, 2018; Svensson, 2000）。

man and Miguel, 2010; Grossman, 1992)。此外，Nielsen 等學者藉由 Fearon (1995)⁵ 解釋衝突的理性主義，認為「援助的崩盤」(aid shock) 會導致政府與叛軍之間實力上的彼消我長，當給予政府的援助減少後，叛軍相對強大 (Nielsen et al., 2011)。而失去援助資源的政府，也失去了「賄賂」反對勢力的資源 (Dal Bó and Powell, 2009)，故援助會增加內戰風險。第二，間接的關係指援助對發展之間關係具有「條件性」，例如好的制度可以讓援助減少對內戰的影響 (Jablonski, 2014)，而分配不均的援助，反而會助長人民的憤恨 (Esman and Herring eds., 2003)。一旦中央政府無法有效率地分配援助，反而會提升內戰的風險。

除此之外，許多學者質疑援助對於弭平衝突的成效，例如 Findley 等學者在研究援助與內戰的地理資料後，認為在獅子山共和國、安哥拉以及莫三比克的案例數據，援助促成了內戰的爆發，援助越密集的区域，越是內戰爆發的地方 (Findley et al., 2011)；Goodhand (2002) 研究國際援助於阿富汗的案例後發現，援助對於戰後和平的效果十分有限，如果沒有好的先決條件介入，援助對於戰後和平並沒有幫助，但何種先決條件是有效的並不容易判斷。即便是人道救援，也可能對於內戰的持續造成不良的影響，例如美國的食物援助 (food aid) 事實上延長了內戰，但研究者並沒有發現美國給予的食物援助對內戰爆發間顯著的關係 (Nunn and Qian, 2014)。

即便許多學者質疑援助與內戰之間的關係，仍有學者相信援助可以消弭內戰國家的衝突並達成和平 (DAC, 2012; OECD, 2016)。Savun and Tirone (2011; 2012) 以政治及經濟因素解釋援助的確對內戰的消弭有幫助，例如民主轉型的國家容易發生內戰，因為在民主化的國家中會有「承諾」以及「不確定」的問題，造成民主難以鞏固，甚至因此更容易發生衝突，但是針對促進民主的援助卻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對民主的援助可以被視為對民主制度的背書，進而解決承諾以及不確定性的問題。另外，他們也以經濟因素回應

5 Fearon (1995) 認為，戰爭要付出很昂貴的代價，因此戰爭會爆發也是因為協議的破裂，而協議破裂是因為第一，可信的承諾的問題，第二，不完全資訊，導致彼此對對方的動機以及偏好的誤判。

了 Nielsen 等學者所提到的「援助崩盤」的問題。援助是可以幫助國家克服內戰的風險，因為援助可以幫助國家克服「經濟衝擊」(economic shock)，也可以在國家政權面臨不穩定時，資助國家預算以及度過經濟危機。也有學者認為，因為援助提供法律、安全以及公共建設等服務，讓曾經發生過內戰的國家可以在戰後的復興更為健全，進而降低下一次新衝突發生的可能 (Ndikumana, 2016)，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兩者並沒有關係 (de Ree and Nillesen, 2009)。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援助對於內戰的關係經由不同的機制，仍然在學者之間辯論，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以上的文獻也可看出過去研究論述中的不足以及可能出現的缺失：第一，學者認為援助會造成叛軍的掠奪與尋租，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但是這忽略了援助很大的一個特徵，援助與自然資源同屬於「租金」，也就是政府不勞而獲的資源，然而資源租金是來自於本國的產出，而援助則是來自於國際社會，必須仰賴他國或是國際組織政策的形成確定後，才能夠獲得的資源，因此一旦政權更迭，援助國可以停止或減少對該國的援助，也就是拒絕給予援助國內的反對團體，因此援助經常浮動，而承諾也非不變且無法持續 (Altincekic and Bearce, 2014; Bulíř and Hamann, 2008)。第二，若以物質力量的角度來解釋援助減少後，會造成衝突的兩造權力上的改變進而影響內戰的風險 (Nielsen et al., 2011; Savun and Tirone, 2012)，這樣的解釋可能忽略了援助在物質以外的因素，例如援助不僅僅造成受贈國物質力量的提升，也會給予受贈國家政府信心，而變相地打擊叛亂份子的士氣，也就是評估戰爭成功的機率，是一種有利於當地執政政府的干預。最後，雖然有學者將援助再分類，認為不同的援助可能帶給受贈國家不同的效果。然而這樣的主張有其弱點，官方發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以下簡稱 ODA) 的用意在於幫助受贈國家的經濟發展，然而這樣專款專用在先前的文獻回顧中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來肯定 ODA 可帶來顯著正面的幫助。例如食物援助反而延長內戰 (Nunn and Qian, 2014)，而 Savun and Tirone (2011) 則認為有關「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民主援助」，可以幫助有潛在內戰風險的國家避免內戰，然而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被包裝為 ODA 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援助國其實也無法保證專款確實可以

專用，若沒有極度嚴格的監督機制，也只能尊重當地政府的使用方式（Acht et al., 2015; Asiedu et al., 2009）。

回顧過去的文獻，本文認為過去的研究仍然有其未盡完善之處，例如作者首先分析援助的特徵後，並不認為援助會以掠奪的方式來增加內戰的機率，此外，在援助所帶來物質資源的功能之外，作者也加強援助作為一個「支持信號」的功能，援助的政策給予了潛在衝突方（政府與叛軍）信號，也就是表示對於現任政府的態度，這降低了和平解決的可信度以及戰爭的成本，反而造成了內戰的風險提升。而下節的理論部分將以上述文獻未能處理的部分，發展為本文的理論。

參、援助的信號與內戰的爆發

本文認為援助與內戰具備直接與間接的關係。第一，這種外部的資源無法直接改善受贈國家的經濟政治情況而消滅內戰的起因；再者，援助是一種支持受贈國政府的「信號」，這樣的信號促使和平協議的困難增加，因為這惡化了「承諾問題」，而援助降低了戰爭成本，並相對地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因此，國家領導人與反對勢力或叛軍，都難以採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歧異。

一、援助的成效並無法消滅內戰的發生

過去對於援助效果的討論非常多，例如，援助是否可以藉由改善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狀況，進而降低內戰的可能？援助主要的目標就是促進受贈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期而言或許援助的確促進經濟方面的表現（Sachs, 2006; Cali and te Velde, 2011; Lof et al., 2015），但也可能造成不平等的現象（Arndt et al., 2015）。另一方面，更多的學者發現援助對於發展並沒有幫助（Deaton, 2013; Easterly, 2003; Moyo, 2009; Briggs, 2017），甚至援助越多，受贈國家反而更貧窮，減少援助反而使得國家有更好的機會發展（Calderisi, 2006; Glennie, 2008）。⁶ 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援助對於發展的效用有條件性，例如受贈國家

6 除了經濟成長與收入之外，援助也不一定增加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治理良善與否？收入是否嚴重失衡（不平等）等（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Collier, 2007; Clemens et al., 2012）。

政治上的不自由是引發民怨甚至國內衝突的另一個原因，同樣地，援助對於受贈國家完成民主化也沒有幫助（Bermeo, 2011; 2016），甚至增加受贈國家的貪污程度（Acht et al., 2015）；而援助國也會因為本身的戰略目的傾向於迴避多邊組織，偏好以雙邊（bilateral）援助的方式給予（Reinsberg et al., 2017; Werker, 2012）。⁷另一方面，若援助國家對於受贈國家有較少的戰略利益，援助的成效反而比較好（Girod, 2012）。⁸而也有學者認為在援助的短時間內，受贈國家會以政治民主化的方式回應援助國的期待，因此援助還是對建立當地的政治制度有幫助的（Jones and Tarp, 2016; Reinsberg, 2015）。

由此可知，援助是否可以藉由可能的正面成效，消弭國內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情緒，進而降低內戰的風險？答案並無法肯定。

二、國際社會支持的信號：援助

援助跟自然資源一樣，屬於「非稅收」（non-tax income）的收入，卻有些許不同。即便援助國一般在給予援助的時候嘗試著指定援助的用途，也就是寄希望於達成發展的目標，但是實際上援助國很難掌握援助的去向，因此也無法過度干預援助的使用來確保援助成效（Acht et al., 2015），換言之，除了貸款之外，援助是不可逆的（Asiedu et al., 2009），貸款也很可能因為受贈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情況，而出現不同的還款結果；即便是人道救援的食物以及藥物等，也很難確定受贈國政府會將這些物資送往真正需要或是援助國想要贈與的人民與對象手中。因此，當兩國利益無法協同時，基於不可逆以及

FDI）而幫助經濟成長（Kimura and Todo, 2010），甚至若給予受贈國家援助，會排擠私人投資的進入（Selaya and Sunesen, 2012）。

7 舉例來說，學者 Woo 在 2017 年的文章將干預國的動機作了清楚的研究，他認為干預國家的動作考量在於國家利益，當受贈國家產油時，援助國會更願意去干預受贈國家的國內政治穩定，確保油源以及適當的石油價格（Woo, 2017）。

8 學者 Girod (2012) 認為，有效的援助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援助國與受贈國間的戰略利益牽連較少；以及第二，當受贈國家擁有較少的租金收入時，這樣的援助較容易達成發展的目標。

無法掌握援助確實效果的情況下，援助國便可以基於戰略性的考量而終止援助。援助可以依據「徇私主義」(favoritism)而發放，所以當援助國的利益無法經由援助在受贈國實現時，援助自然會被終止 (Bearce and Tirone, 2010; Bulíř and Hamann, 2008; Dreher et al., 2013)。

換言之，援助就是對於受贈國政府支持的「信號」。如同干預一般，這樣的信號也是偏頗的，干預者也想要藉由援助來平衡以及讓目標國國內勢力選邊 (Saideman, 2002)，而偏頗的信號則是援助國選擇有利於政府政策 (Findley and Teo, 2006)。⁹ 若援助國對於受贈國家行為感到不滿，援助便可以停止，讓金援無法再成為受贈國家領導人的非租稅收入 (Altincekic and Bearce, 2014)，援助國也根據自己國內的政治情況 (例如選舉) 而做出經濟外交 (例如援助或制裁) 的決定，而不需考量受贈國家的發展情況 (Heinrich et al., 2017)。除了援助代表國際社會支持當地政府的信號外，本文認為援助身為國際社會表達支持的信號，也惡化了承諾的問題，並降低戰爭成本與增加權力分享的相對成本，進而增加了內戰的風險。

三、內戰的發生與援助：承諾問題與戰爭成本

衝突可能潛在已久，但是戰爭的爆發有其升級的機制。衝突的兩(多)方都會先尋求和平解決的可能，政府領導人也會考慮「成本效益」，當和平解決衝突的機會不可能時，或是戰爭的成本低於和平，戰爭才可能是政治領導人的優先選項，這也是 Fearon 分析戰爭爆發的「理性途徑」(rationalist approach) (Davies and Johns, 2016; Fearon, 1995)。研究內戰爆發，也就是研究和平協議為何失敗，有鑑於以上援助的特點，本文認為援助是對受贈國支持的信號，影響「承諾問題」與「戰爭／和平成本」，使得在國內政治動亂之際，和平協議無法達成，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

9 許多的研究已經指出發展是援助的「副作用」，援助不一定針對貧窮國家，而良好治理的國家也不一定得到更多的援助做為獎勵 (Briggs, 2017; Goldsmith, 2001)，既然援助不必然為了發展而存在，援助在受贈國家發生任何政治動亂進而可能危及國內人權時 (包括因為政治情況不穩定，政府使用危害人權的方式鎮壓等) 還是有可能會繼續，特別是透過雙邊的方式給予的援助，並不一定會因受贈國家國內有違反人權的事例而減少 (Heinrich et al., 2018; Lebovic and Voeten, 2009)。

和平協議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為做出政策的改變以符合反對勢力的期待，二為政府承諾與反對勢力分享權力（Hartzell and Hoddie, 2003），但這兩種方式都牽涉和談雙（多）方的承諾以及政府如何分析成本的問題，本文認為從援助所帶來的「信號」，會惡化承諾問題以及降低戰爭成本，也使得和平解決爭端的成本上升，而內戰的風險增加，說明如下。

第一，援助無益於政府維持政策改變的承諾，對於達成和平協議並無幫助，進而增加內戰風險。消弭反對勢力的和平解決方式中，有一種是改變現有或既有的政策以扭轉人民的不滿。如果反對者同意政策的改變，也相信這樣的承諾會長期地執行，那麼和平協議達成。相對於戰爭，政策的改變的確成本較小，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偏好的選項，然而，援助卻降低協議成功的可能性，因為援助會降低叛軍或反對勢力相信政府會改變政策這個承諾的決心。

政策上的讓步必須是根本且長期持續的改變，叛軍必須相信政府不是以「炒短線」的方式短暫地讓反對勢力或叛軍讓步，而規避政策最終的改變以及可能的武裝衝突。在大量國外援助的支持之下，叛軍無法相信政府能夠實踐並貫徹兩造協商的政策內容。因為第一，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援助無法保證在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改善，所以叛軍或反對勢力並不期待可以透過得到更多的援助而改善他們不滿意的政經現狀，所以當現任政府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反對勢力不會相信現任政府可以藉由獲得更多的資源，而做出政策上符合且有益於反對勢力期待的改變。

再者，雖然援助等同於對受贈國家掛了「準保證」（Kimura and Todo, 2010），但援助是可以減少或終止，也就是變相的經濟制裁，雖然援助國進入受贈國家的資源不可逆，但援助可以隨時喊停。然而國際社會透過援助，繼續與對抗反對勢力的現任政府合作，若援助在內戰潛在發生的情況之下增加，讓反對勢力不滿的政策很有可能繼續（Uzonyi and Wells, 2016），因為政府沒有改變的動機，即便有暫時的動機，在國際社會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之下，現任政府為了抒解燃眉之急而改變政策的承諾，在反對勢力或是叛軍眼中都失去了可信度。例如南蘇丹內戰從 2011 年獨立後不久開始爆發，但是和平協議遲遲無法簽署，壓力反而回到國際社會是否可以幫助交戰的各方談判與執行協議（de Vries and Schomerus, 2017）。國際社會的信號與政府給予人

民的承諾息息相關 (Crescenzi et al., 2012; Horowitz et al., 2017; Mattes, 2012)，更多的援助只會讓叛軍對於政府維持協議的不信任感增加，無法強化在協議中承諾的問題，因為只要有國際社會的支持，政治領導人的政策改變無法令人相信會持續執行。

第二，援助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且降低戰爭成本，使得和平解決爭端的機率降低，提高內戰的風險。除了改變政策外，政府還可以與反對勢力共享權力來和平解決潛在爭端。權力分享不僅僅是政策上的改變，也要分享執政上的權力，例如讓反對勢力進入政府或是立法機關等。雖然權力分享也可以視為一種政策的改變，但相對於改變政策，權力分享的代價會更昂貴，因為當政治領導人決定以和平或衝突解決爭端時，政治上的計算很重要，但是援助並不會讓戰爭的成本高於權力分享的成本，反而因為援助降低了戰爭成本，相對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進而提升內戰的風險。

首先，權力分享的成本本來就比較高，因為除了人民的福祉之外，執政者更重視的就是權力的掌握，民主國家亦然；再者，當政府提出權力分享，反而會給予人民支持反對勢力的動機，因為權力分享就是示弱的表現，也代表著政府承認人民的不滿有理，這樣的情況下，叛軍的士氣也隨之水漲船高，對於權力分享協議的要求更高，又或是根本不願意以和平協議解決爭端 (Mukherjee, 2006)，因此，在權力分享這個昂貴的選項下，解決爭端本屬不易，若政府與叛軍之間要協調的權力分享協議越多，以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性越低，因為權力分享的要求越多，特別是分配資源方面 (Findley, 2013)，政府更不願意放手更多權力，而叛軍也可能不願意接受政府所承諾的權力共享方式，所以權力分享不僅僅是成本高，基本上不是一個容易成功解決爭端的途徑。

第三，除了權力分享的成本高，援助也會讓戰爭的成本降低。在國家政治狀況開始不穩時，政府在整體實力上還是具有相對優勢的 (Cunningham et al., 2009: 574)，對於政府而言，援助很有可能可以變成軍事資源。雖然有學者對於援助究竟是否可以轉化為軍事力量抱持懷疑，認為援助不像其他資源 (例如石油)，可以簡單地轉換為軍事實力 (Paine, 2016)，但援助也並非不可替代的資源，因此援助不僅僅是經濟手段，也可能是一種軍事干預 (Easterly,

2008)。國際社會若給予交戰團體越多可替代性資源，衝突中的不確定性會增高（Sawyer et al., 2017），若戰爭的成本降低，相對地和平解決權力分享的成本也就升高，只得藉由軍事上的勝利（military victory），才可以根本上消滅叛軍的軍事力量，達成較久的政治穩定（Licklider, 1995）。

由於無法追蹤援助的去處，若國際社會繼續給予政府援助，便降低了無論是軍事、人道或是醫藥食品這些「戰爭的成本」，提高了衝突的風險（Kuperman, 2008; Narang, 2015; Rauchhaus, 2009; Spaniel, 2018），因為國際社會給予的援助，減低了戰爭對於政府的傷害與戰爭的成本，增加權力分享的代價，若政府能以較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與叛軍的爭端，甚至解決叛軍本身，為何要選擇成本高而政府其實又不甘願的權力分享？

如上所述，援助就是一種對政府物質上與政治上的支持，但遺憾的是，我們即便瞭解援助多流向何種國家，卻很難區分援助國的動機。本文認為，援助如果增加或持續，就代表援助國認同並支持現任政府的作為，若不支持就不會給予更多援助。例如 OECD 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 DAC）國家¹⁰ 設下種種援助條件來限制受贈國家使用援助，然而不是每個援助國家的出發點都是「發展」，甚至敵對政府也不會想要看到受贈國家的政治不穩甚至政權被顛覆，因為即使敵國不喜歡現任的政府，但是也不能擔保經過衝突上台後的新政權可以在彼此的政策偏好上有更大的交集，同樣地，在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之下，敵國也不希望（並非永遠不會）見到非常規性的政權轉移，希望現任政府可以藉由援助維持穩定（Jones and Tarp, 2016; Uzonyi and Rider, 2017; Wolford, 2007）。因此，援助作為國際社會支持的信號，第一，援助無法增加和平協議中承諾的可信度；第二，援助會降低戰爭的成本同時提高權力分享的成本，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

越多的援助會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

10 DAC 成員國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歐盟、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斯洛伐克、斯洛伐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與美國，參考 OECD 網頁：<http://www.oecd.org/dac/dacmembers.htm>，（檢閱日期：2018 年 7 月 29 日）。

肆、研究設計

本文假設在檢驗「援助是否與內戰的爆發呈現正相關」，因此結果變數是內戰的爆發，解釋變數是 DAC 雙邊援助的金額。由於內戰爆發是二元變數，若該年內戰爆發，編碼為 1，其餘則為 0，本文資料從 1960 年到 2017 年，為縱橫資料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data)，第一層分析單位是國家——年，第二層是國家，因此使用多層次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李佳怡、蔡宗漢, 2015)。除了結果變數與解釋變數，本文也納入其他相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控制變數，例如經濟成長、人均 GDP、自然資源租金、貿易開放程度、軍事支出、政治權利，以及社會分裂。模型除了排除「高所得國家」的樣本外，亦控制了不同收入的國家、不同區域、不同政權，以及冷戰時期。此外，也檢驗不同的援助金額作為穩健性分析。為了避免本文結果變數以及解釋變數間產生內生性 (endogeneity) 問題，本文的解釋變數均設定為較結果變數早一年，避免兩者間發生可能的「相反因果」關係。最後，為解決模型可能發生的自我相關 (autocorrelation) 問題，也控制和平時期 (年) (Beck et al., 1998;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 Woo, 2017)。模型所使用變數的敘述統計請見表 1。模型方程式如下：

$$\Pr(\text{內戰爆發}_{i,t}=1) = \text{logit}^{-1}(\alpha_i + \beta \text{援助}_{i,t-1} + X_{i,t}\gamma) \quad (1)$$

$$\alpha_i \sim N(\mu_\alpha, \sigma_\alpha^2) \quad (2)$$

方程式(1)呈現在 t 年國家 i 是否爆發內戰的變數參數， β 是本文主要解釋變數，也就是援助 (前一年) 的迴歸係數， X 和 γ 是控制變數以及其迴歸係數，(1)與(2)的 α_i 是國家效果的變動截距，根據平均數 μ_α 以及變異數 σ_α^2 的常態分配。

表 1：敘述統計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內戰爆發			0 (n=13436)	1 (n=604)	14040
DAC 雙邊援助 (億美金)	2.18	5.35	-9.55	220.28	7504
ODA 與官方援助 (億美金)	3.01	6.56	-9.47	220.57	7717
UNICEF 援助 (億美金)	0.04	0.07	-0.10	0.79	5111
和平期間 (年)	24.81	20.40	0	72	13973
人均 GDP (萬美元)	0.82	6.44	0.00	555.91	8897
GDP 成長	3.90	6.62	-64.05	149.97	8539
貿易開放	76.04	48.63	0.02	531.74	8121
自然資源租金	7.17	11.122	0	89.90	7641
軍事支出 (億美金)	55.98	334.34	0	7113.38	7040
政治權利	3.76	2.23	1	7	7615
族群分裂	0.44	0.26	0	0.93	12567
宗教分裂	.44	.23	.00	.86	12709
亞洲			0 (n=10872)	1 (n=3168)	14040
非洲			0 (n=10080)	1 (n=3960)	14040
歐洲			0 (n=10584)	1 (n=3456)	14040
美洲			0 (n=11592)	1 (n=2448)	14040
大洋洲			0 (n=13032)	1 (n=1008)	14040

一、變數

(一) 結果變數

內戰的爆發是本文的結果變數，如上所述，該年若為內戰爆發當年，編碼為 1，此外，若該年又增加不同的國內的交戰團體加入，亦被編碼為 1，其餘為 0。內戰爆發的資料庫為 UCDP/PRIO¹¹ 武裝衝突資料庫 (Armed conflict

11 UCDP/PRIO 武裝衝突資料庫由「烏普薩拉衝突資料計畫」(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以及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內戰研究中心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 at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Oslo) 共同合作。

dataset, version 18.1)。¹² 資料庫收錄的內戰衝突，其標準的門檻為該年因戰爭相關而死亡的人數超過25人 (Gleditsch et al., 2002; Pettersson and Eck, 2018)。

(二) 解釋變數

本文的解釋變數是援助的金額，解釋援助可以第一，透過援助所傳達支持內戰國政府的信號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第二，援助會降低衝突的成本以及增加和談成本，因此增加內戰的風險。本文採用 DAC 雙邊援助的淨金額（單位：現值美元）作為解釋變數援助的代理變數，「雙邊」援助可以充分代理援助國以援助的形式而給予受贈國家信號而影響承諾問題以及戰爭成本：第一，雙邊援助是最具有戰略性的援助，因為援助所受到來自多邊架構下的壓力較少 (Reinsberg et al., 2017)，也不會受到國際組織團體援助的限制，雙邊架構之下，援助國可以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排除阻礙多邊援助所需要經過的審核以及質疑用援助來表達對受贈國的支持。文獻也顯示，雙邊援助的金流要看援助國與受贈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援助國的信念會在受贈國家中被執行 (Schudel, 2008)，因此雙邊援助具有高度的信號意義，而幫助發展的意義也不高 (Werker, 2012)；此外，基於這樣的理由，若援助國想要表達對受贈國家的不支持，最快解除這樣支持信號與資源的方式就是藉由雙邊援助，因為這樣牽涉的規範以及援助方是最少的，因此，當援助國想要以援助來表達對受贈國的支持，雙邊援助會是很好的觀察數據；第二，雙邊援助就是一種金援，所以援助不僅僅是支持的訊號，而實質的金流同時可以帶給受贈國家實際幫助，讓整體國家發動戰爭的成本降低，進而增加權力分享等和談的成本。DAC 援助包含了兩個部分：ODA 以及官方援助 (official aid)，¹³ 根

12 UCDP/PRIO 武裝資料庫包含 4 種武裝衝突的形式：超體系戰爭、國際戰爭、國內戰爭以及國際化的戰爭，而本文的結果變數是「內戰」的爆發，因此刪去資料庫內第一以及第二種的衝突類型。

13 DAC 當年雙邊援助為當年 DAC 援助國所給予的援助再減掉受贈國家當年可以償付過去援助項目中的貸款項目。ODA 援助具備一定的優惠條件 (concessional terms)，項目其中必須包括 25% 的贈與，且贈與的項目需與促進經濟發展與福祉有關；而官方援助就是 DAC 國家給予受贈國家的捐贈金額。OECD 會考慮適當的 ODA 接受國家或領土，在 OECD 國家所提供的名單內，才能被稱為 ODA (OECD, 2020)。而 ODA 也不同于人道援助 (human-

據 OECD 的網頁，ODA 不同於其他官方援助在於其用意為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福祉，¹⁴ 本文資料庫中有 DAC 國家捐贈的國家有 155 個，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以下簡稱 WDI），資料時間為 1960 年到 2017 年。

除了 DAC 雙邊援助之外，其他援助是否也具備一定的信號作用，根據作者的理論，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即便某些雙邊援助暫停或中止，只要國際社會其他國家，或是主要援助國際組織仍然給予受贈國家援助，那麼仍然是一種支持的信號，此外，援助也是一種資源，只是理論上雙邊援助的戰略性會更強一些。作者使用另外兩個不同測量方式的援助來進行穩健性分析：ODA 與官方援助，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這兩個援助變數未若 DAC 的雙邊援助的戰略性，但是作者認為，這兩種援助仍然會代表援助國給受贈國支持的信號，因為援助不是簽約，可以給也可以撤，更不會像制裁機制一般的複雜，因此作者認為仍然會影響內戰的風險。ODA 與官方援助是受贈國收到 ODA 與官方援助的加總，不限於雙邊援助；另一個是聯合國下的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以下簡稱 UNICEF¹⁵）的捐贈，作為穩健性測試中的主要解釋變數。DAC 雙邊援助作為雙邊援助具有相當的戰略性，然而透過多邊架構下的援助也不能否認其戰略意義，因為多邊架構與雙邊援助的差異主要在於援助的給予基於「多邊」的政策，倘若多邊架構也有其「戰略」以及援助的特殊意義，援助當然是給予受贈國的信號。UNICEF 援助包括了大部分為 ODA 為主的援助，以及其他官方金流，而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贈與的援助，除了以發展為目的之外，人道的精神會高於其他援助。據此可以觀察第一，多邊援助（聯合國組織）是否就可以將任何援助對於消弭衝突的負面效應抵銷？另一方面，UNICEF 的援助是以人道為

itarian aid) 與軍事援助 (military aid)，人道援助包括了醫療、食物以及其他的急難救助，而軍事援助是針對軍事方面的援助，所以與 ODA 有不同目標上的差異 (Findley, 2018)。

14 ODA 的援助內容包括捐贈、軟貸款 (soft loans, 基於市場利率的貸款)，還有技術協助等。

15 其簡稱來自於其舊稱「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UNICEF 援助是 UNICEF 給予受贈國家的官方援助，包含了 ODA、官方援助，以及其他的官方資助 (other official flow)，而這些贈與的用途以推廣經濟發展為主要目的。

主的金援（援助的目的在於增進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兒童福利），是否也可以推翻本文的推論，進而改變內戰爆發的風險。資料來源為 WDI（World Bank, 2018），單位是百萬現值美金。以上三個援助金額分配都高度右偏（skewed distribution），故取對數值（logged）。

（三）控制變數

過去的研究發現，影響內戰爆發的變數大致有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等變數，例如經濟因素方面，**人均 GDP**（單位為現值美金）與 **GDP 經濟成長** 都代表了該國的經濟表現，人民的生活水準越高，內戰越不容易發生（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 2004）。人均 GDP 金額分布右偏，故取對數值。**貿易開放** 程度是該國貿易商品出口價值佔該國的 GDP 比例，比例越高代表該國越仰賴出口做為國家的收入，對外開放程度也比較高，當國家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內戰的經濟成本也更高，因此越高的貿易開放程度，可能會降低內戰爆發的風險（Magee and Massoud, 2011），而援助國也會因為受贈國家在貿易政策上的改革而更願意給予較多的援助，以上數據來自 WDI。另外，政治方面的控制變數是**政治權利**，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分數由最不自由的 1 分到最自由的 7 分。政治權利的資料取自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18），政治自由也經常被研究內戰的學者所討論，政治權利賦予了公民在面對不滿時合法宣洩的管道，越自由的政治環境，使用武裝衝突改變現狀的風險會越降低（Hegre et al., 2001），而國際社會也可能因為該國是否遵守國際社會的期待而改變贈與的金額。

此外，模型也控制許多過去文獻中所討論造成內戰的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租金**¹⁶、**軍事支出**以及**社會的分裂**。首先，當國家越仰賴自然資源的收入，會更容易產生許多政治與經濟上的問題，進而成為國內衝突的因子（平思寧，2014；2015），因此自然資源租金也是本文控制的一個變數；軍事支出代表該國軍事用途上的支出，金額（單位為百萬現值美金）越多代表該國政府的

16 自然資源租金為多種資源的租金加總，其中包括：石油、天然氣、煤（軟煤與硬煤）、礦產以及木材租金（World Bank, 2018）。

武裝準備越充分，由於分布也過於右偏，故取對數值。以上資料均來自 WDI (World Bank, 2018)。最後，內戰也可能來自於社會因素，特別是族群與宗教分裂引發的衝突 (Fearon and Laitin, 2003)，因此本文也加入**族群以及宗教的分裂**為控制變數，分裂的定義在於國家內的不同團體，擁有不同族群標記的機率，分數越高代表越高的機率來自於不同的族群，也就是越分裂的族群社會 (Alesina et al., 2003)，資料來源為「政府品質資料庫」(Quality of Government, 簡稱 QoG)，而族群與宗教差異的資料並非每年都進行蒐集更新，而 QoG 資料庫將其視為「歷史變數」，重複其中部分的數據並延伸至其他年份 (Teorell et al., 2020: 101)。

最後，為了避免本文模型中的自我相關問題，模型中均加入 3 個控制變數：和平期間 (年) 的 1 到 3 次方多變項 (Beck et al., 1998;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 Woo, 2017)，避免在二元縱橫資料中可能發生的自我相關。

二、統計結果

本文共有 10 個模型，檢驗國際援助對內戰爆發的關係，統計結果請見表 2。本文模型主要區分第一，不同的觀察值，例如在世界銀行的國家收入分類中，有「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以及「高所得國家」，本文刪除「高所得國家」後，就不同所得國家進行分析，但由於援助多進入中低收入的國家，因此將以「低收入國家」以及「中低收入國家」作為主要模型的觀察樣本。第二，援助有不同類型，除了主要的雙邊援助之外，也同時測試多邊組織下的 UNICEF 援助，以及官方和 ODA 的援助金額。第三，檢驗不同的國家類型以及觀察值的時間。

模型 1 中的觀察值是「低收入國家」以及「中低收入國家」，將結果變數延遲一年，統計結果發現當援助的金額越高，內戰爆發的機率也越高 (圖 1)，另外，將結果變數延後三年後的模型 2，也可以看到一樣的結果，在降低了內生性的可能之後，雙邊援助金額與內戰爆發的機率仍然是正相關。在控制變數方面，兩個模型多是相同結果。顯著的控制變數包括人均 GDP 越高的國家，越不容易發生內戰，自然資源租金越高以及軍事支出越高的國家，越容易發生內部衝突，GDP 成長率、政治權利以及社會 (族群與宗教)

表 2：內戰的多層次估計模型結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3 年)	中、低 收入國家	UNICEF 援助	官方與 ODA 援助	區域	軍事 政權	非軍事 政權	冷戰	非冷戰
內戰爆發 (延遲)	.77*** (.18)	.71*** (.18)	.70*** (.18)	.66*** (.19)	.79*** (.17)	.76*** (.18)	1.05*** (.28)	.91*** (.21)	.80** (.38)	.59*** (.21)
DAC 雙邊援助	.12** (.06)	.14** (.06)	.10* (.06)			.09 (.06)	.28*** (.10)	.16** (.06)	-.09 (.11)	.14* (.08)
UNICEF 援助				.25*** (.07)						
ODA					.14** (.06)					
人均 GDP	-.24** (.10)	-.36*** (.11)	-.44*** (.10)	-.22* (.12)	-.23** (.10)	-.21* (.11)	.20 (.18)	-.03 (.09)	-.35 (.22)	-.27* (.12)
GDP 成長	.01 (.01)	.00 (.01)	-.01 (.01)	.02* (.01)	.01 (.01)	.01 (.01)	.04** (.02)	-.00 (.01)	.02 (.02)	.01 (.01)
貿易開放	-.01* (.00)	-.01* (.00)	-.00* (.00)	-.01** (.00)	-.01** (.00)	-.01** (.00)	-.01* (.01)	-.01*** (.00)	-.01 (.01)	-.01* (.00)
自然資源租金	.03*** (.01)	.03*** (.01)	.03*** (.01)	.03*** (.01)	.03*** (.01)	.03*** (.01)	.03* (.01)	.03*** (.01)	.02* (.01)	.03*** (.01)
軍事支出	.21*** (.05)	.23*** (.05)	.24*** (.05)	.17*** (.06)	.19*** (.05)	.21*** (.06)			.23* (.11)	.23*** (.06)
政治權利	-.03 (.05)	-.05 (.05)	-.00 (.05)	-.01 (.05)	.02 (.05)	-.06 (.05)	-.14* (.12)	.04 (.05)	-.13 (.09)	-.01 (.06)
族群分裂	-.14 (.27)	-.10 (.28)	-.08 (.27)	.02 (.28)	-.12 (.27)	-.13 (.28)	-.46 (.54)	.12 (.32)	-.57 (.53)	.03 (.33)

宗教分裂	.22 (.34)	.25 (.35)	.21 (.33)	.16 (.35)	.16 (.33)	.21 (.34)	.63 (.69)	-.17 (.39)	.40 (.71)	.26 (.41)
亞洲						.23 (.80)				
非洲						.32 (.79)				
歐洲						.41 (.88)				
美洲						-.23 (.82)				
大洋洲										
和平期間 (年)	-.19*** (.03)	-.18*** (.03)		-.20*** (.03)		-.19*** (.03)	-.14*	-.19*** (.03)	-.01 (.08)	-.22*** (.04)
和平期間 (年) ²	.01*** (.00)	.01*** (.00)		.01*** (.0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1*** (.00)
和平期間 (年) ³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觀察值	2789	2707	3222	2580	2838	2789	650	2830	911	1818
國家數	112	112	110	108	118	112	47	129	74	110
Log likelihood	-682.92	-635.45	-716.79	-615.14	-690.79	-680.98	-213.59	-531.16	-196.14	-455.16
AIC	1393.84	1298.90	1461.59	1258.27	1409.58	1397.96	453.18	1088.32	420.28	938.31
BIC	1479.91	1381.55	1546.68	1340.25	1492.89	1504.76	511.38	1165.64	487.68	1015.39
ICC	.15	.14	.12	.14	.15	.15	.19	.16		

() 內為標準差，顯著水準：* $p < 0.10$ ；** $p < 0.05$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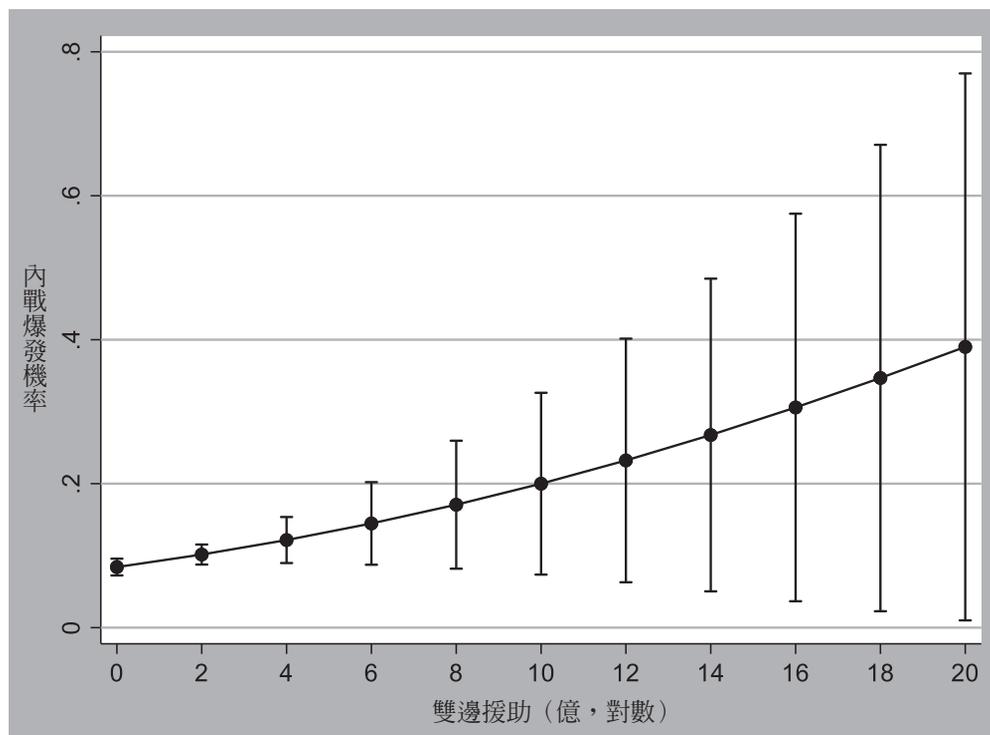


圖 1：雙邊援助金額與內戰機率

分裂程度，則不顯著。

模型 3 加入了「中高所得國家」，結果與模型 1 是相同的，解釋變數方面依然是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在樣本數納入「中高所得收入」國家後，雙邊援助的金額還是會增加內戰的風險；其他的控制變數結果與前述的模型相同，人均 GDP、資源租金以及軍事預算對內戰爆發同樣是顯著正負向關係。

模型 4 與模型 5 替換了不同的援助金額，測試是否援助都會帶給內戰不良的影響。模型 4 的結果變數改為 UNICEF 所給予的援助金額，模型 5 是官方援助加上 ODA 的金額，統計結果發現在這兩個模型中，無論是多邊援助或是具有 ODA 性質的援助都會顯著地增加內戰風險，換言之不論類型，援助都會增加內戰的風險。其他的控制變數結果與之前的結果相似，只是 GDP 成長在模型 4 中變成正向顯著，也就是當 GDP 成長率越高，國家發生內戰的風險會降低。

模型 6 中在控制了不同的區域（加入地區的虛擬變數）後，援助金額對

內戰的風險卻不顯著，而在模型 7 與 8 中，將國家區分為「軍事政權」以及「非軍事政權」的觀察值，結果發現援助對於兩種類型政權都會有影響，只是在軍事政權的國家中，政治權力越高內戰可能性越低；而區分觀察值時期的模型 9 與 10 中，在冷戰期間，援助金額對於內戰風險沒有影響，而自 1989 年冷戰結束之後，援助金額便顯著地提升內戰的風險。

除了在冷戰時期以及控制區域後，援助金額的增加也同時會顯著地提升內戰的風險，無論是雙邊援助、多邊援助，以及開發援助都具有這樣負面的效果。而控制變數方面，過去文獻經常提及影響內戰爆發可能的經濟表現以及資源租金等不利因素，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穩定的效果，而軍事支出以及貿易開放，在本文的分析中，也與內戰的風險有關。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上的目的，援助長期以來的目標就是促進受贈國家的發展，但事實上援助一直具有高度戰略性意義，不僅僅純粹地以降低貧窮為目標。作為國家經濟外交的手段之一，援助有相當濃厚的政治意義，藉由經濟上的支持，改變受贈國家的政策，也是一種對受贈國家的干預。援助很大一部份流入貧窮國家，貧窮又是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援助具有更大的戰略意義，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便連結了這樣的現象：援助是否較可能導致內戰的爆發？

援助作為來自外部的資金，這樣的收入使用端視政治菁英的決定，但是援助是可以減少，甚至終止，除了受贈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之外，受贈國政府與援助國的關係是關鍵因素，因此，援助可以視為國際社會或援助國給予受贈國家的信號，因為援助一旦進入受贈國家後，援助國除了在之後的援助金額上增減外，無從反悔，因此，援助是援助國對於受贈國家的整體支持。然而這樣的支持信號反而會阻礙和平協議的達成，進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本文認為這樣的信號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阻礙和平：第一，和平協議難以透過政府政策的改變而執行，因為援助的信號使得政府難以信守對於政策改變的承諾，而反對團體對於政府會遵守承諾，以及長期執行改變後的政策內

容並沒有信心，因為在國際社會高度支持現任政府的情況之下，政策的改變只是短期而非長期的根本改革，在現任政治領導人沒有決心，而反對勢力沒有信心的情況之下，和平協議不容易達成。第二，援助讓權力分享的成本增高以及戰爭成本降低，難以讓政府與反對團體達成和平協議，因為當政府必須以高成本的權力讓渡給叛軍或反對勢力，那麼低成本的戰爭仍然是較為可行的選項，因為國際社會的援助實質上降低戰爭的成本，也讓權力分享的成本相對增加，無論是給予資源或是政治上的支持，理性的國家領導人都不會願意採用成本較高的權力分享作為解決爭端的優先選項。有鑑於此，援助在某種程度上，並未鼓勵政府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而本文的穩健性測試也發現，無論是多邊的人道援助或是發展援助，對於內戰爆發還是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支持的信號難以解決政策改變的承諾問題，也同樣地降低了衝突成本，增加權力分享的困難。

本文同時也補充過去文獻對於內戰以及援助的連結，第一，本文強調援助是具有戰略性的，援助國並非沒有目的而給予援助，因此過去將援助視為國家可掠奪性資源來解釋援助與內戰的關係，並不合適；第二，本文也強調援助並非只有物質性的支持，給予受贈國家政治性的支持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第三，本文也透過理論以及經驗的檢視，發現國外援助對於內戰無論是否出之於無意，的確發生負面的影響。本研究企圖將依變數延後 1 年以及 3 年的方式以解決可能的相反因果，但仍然無法完全排除內戰對援助可能造成的影響，未來的研究仍可以嘗試不同的計量模型來排除內戰對援助所造成的可能影響。

最後，原為促進發展的援助是否還能繼續資助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呢？本文雖然發現，援助阻止了和平協議，但是國際社會仍然可以透過降低援助（並非完全取消）給予受贈國家現任政府警告，表示必須以和平的手段儘速處理內亂；另外，若是仍然給予人道救援，也必須集合國際社會的力量監督或介入，例如避免直接給予當地政府，讓當地政府知道這並非是國際社會「支持當地政府的信號」，或是以維和部隊的武裝力量參與，保障該類物資不會在運輸過程中，被反對勢力劫走，進而成為雙方的戰爭資本，降低衝突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衝擊，這樣方能繼續讓國際社會的援助持續，

而謀求受贈國家人民最大的福祉。然而來自其他國家的援助，也可能會透過不同的方式給予叛軍，進而改變本文推論中的「信號」或是「戰爭與協議的成本」的過程，可惜的是我們無法獲得系統性的資料，因此在缺乏國際社會給予叛軍援助的情況下，只能以國際社會對於中央政府援助的多寡作為實證上的研究，此為本文研究問題在資料上的侷限。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平思寧

2014 〈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內衝突起因之探析：政治與經濟的革命？〉，《問題與研究》53(3): 61-86。(Ping, Szu-ning, 2014, "The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s," *Issues & Studies* 53(3): 61-86.)

2015 〈自然資源與國內衝突：權力轉移理論的應用〉，《人文社會科學集刊》27(3): 471-506。(Ping, Szu-ning, 2015,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Conflict: An Applic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7(3): 471-506.)

李佳怡、蔡宗漢

2015 〈國家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外資徵收的成因〉，《台灣政治學刊》19(2): 133-172。(Lee, Chia-yi and Tsung-han Tsai, 2015, "State Capitalism and FDI Expropriation in Latin America,"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 133-172.)

B. 外文部分

Acht, Martin, Toman Omar Mahmoud, and Rainer Thiele

2015 "Corrupt Governments Do Not Receive More State-to-State Aid: Governance and the Delivery of Foreign Aid through Non-State Acto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4(C): 20-33.

Alesina, Alberto, Arnaud Devleeschauwer, William Easterly, Sergio Kurlat,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2): 155-194.

Altincekic, Ceren and David H. Bearce

2014 "Why There Should Be No Political Foreign Aid Curse," *World Development* 64(C): 18-32.

Arndt, Channing, Sam Jones, and Finn Tarp

2015 "Assessing Foreign Aid's Long-Run Contribution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69(6): 6-18.

Asiedu, Elizabeth, Yi Jing, and Boaz Nandwa

2009 "Does Foreign Aid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Expropriation Risk on Foreign

-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8(2): 268-275.
- Balch-Lindsay, Dylan and Andrew Enterline
2000 "Killing Time: 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1820-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4): 615-642.
- Bearce, David H. and Daniel C. Tirone
2010 "Foreign Aid Effectiveness and the Strategic Goals of Dono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72(3): 837-851.
- Beck, Nathaniel, Jonathan N. Katz, and Richard Tucker
1998 "Taking Time Seriously: Time-Series-Cross-Section Analysis with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4): 1260-1288.
- Bermeo, Sarah Blodgett
2011 "Foreign Aid and Regime Change: A Role for Donor Intent," *World Development* 39(11): 2021-2031.
2016 "Aid Is Not Oil: Donor Utility, Heterogeneous Aid, and the Aid-Democratization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1): 1-32.
- Blattman, Christopher and Edward Miguel
2010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1): 3-57.
- Briggs, Ryan C.
2017 "Does Foreign Aid Target the Poor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1): 187-206.
- Bulíř, Aleš and Javier Hamann
2008 "Volatility of Development Aid: 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World Development* 36(10): 2048-2066.
- Burnside, Craig and David Dollar
2000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47-868.
- Calderisi, Robert
2006 *The Trouble with Africa: Why Foreign Aid Isn't Work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ñi, Massimiliano and Dirk William te Velde
2011 "Does Aid for Trade Really Improve Trade Performance?" *World Development* 39(5): 725-740.
- Carter, David B. and Curtis S. Signorino
201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ling Time Dependence in Binary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71-292.
- Clemens, Michael A., Steven Radelet, Rikhil R. Bhavnani, and Samuel Bazzi
2012 "Counting Chickens When They Hatch: Timing and the Effects of Aid on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22(561): 590-617.
- Collier, Paul
2007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1998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0(4): 563-573.

- 2004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4): 563–595.
- Collier, Paul, V. L. Elliott, Håvard Hegre, Anke Hoeffler, Marta Reynal-Querol, and Nicholas Sambanis
2003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rescenzi, Mark J. C., Jacob D. Kathman, Katja B. Kleinberg, and Reed M. Wood
2012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2): 259–274.
- Cunningham, David E.,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2009 "It Takes Two: A Dyadic Analysi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3(4): 570–597.
- DA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2012 "International Support to Post-Conflict Transition," Retrieved Feb. 16, 2020, from <https://www.oecd.org/dac/conflict-fragility-resilience/docs/49372078.pdf>
- Dal Bó, Ernesto and Robert Powell
2009 "A Model of Spoils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1): 207–222.
- Davies, Graeme A. M. and Robert Johns
2016 "The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Over-Cooper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Microfound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3(4): 343–360.
- Deaton, Angus
2013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 Ree, Joppe and Eleonora Nillesen
2009 "Aiding Violence or Peace?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the Risk of Civil Conflict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2): 301–313.
- de Vries, Lotje and Mareike Schomerus
2017 "South Sudan's Civil War Will Not End with a Peace Deal,"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 29(3): 333–340.
- Dreher, Axel, Stephan Klasen, James Raymond Vreeland, and Eric Werker
2013 "The Costs of Favoritism: Is Politically Driven Aid Less Eff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2(1): 157–191.
- Easterly, William
2003 "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 23–48.
2008 "Foreign Aid Goes Militar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Retrieved Feb. 16, 2020, from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foreign-aid-goes-military/>
- Ellison, Christin Smith
2016 "Can the New Deal Solve the Old Problem of Aid Orphans and Darlings? Aid Effectiveness in Fragile State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4(4): 467–481.
- Esman, Milton J. and Ronald J. Herring (eds.)
2003 *Carrots, Sticks, and Ethnic Conflict: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n

- H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Fearon, James D.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379-414.
-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75-90.
- Findley, Michael G.
2013 "Bargaining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tages of Civil War Resolu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7(5): 905-932.
2018 "Does Foreign Aid Build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19): 359-384.
- Findley, Michael G., Josh Powell, Daniel Strandow, and Jeff Tanner
2011 "The Localized Geography of Foreign Aid: A New Dataset and Application to Violent Armed Conflict," *World Development* 39(11): 1995-2009.
- Findley, Michael G. and Tze Kwang Teo
2006 "Rethink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Wars: An Actor-Centric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4): 828-837.
- Fleck, Robert K. and Christopher Kilby
2010 "Changing Aid Regime? U.S. Foreign Aid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2): 185-197.
- Freedom House
2018 *Country and Territory Ratings and Statuses, 1973-2018*. Retrieved Oct. 11, 2019,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freedom-world-data-and-resources>
- Girod, Desha M.
2012 "Effective Foreign Aid Following Civil War: The Nonstrategic-Desperation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1): 188-201.
- Gleditsch, Nils Petter, Peter Wallensteen, Mikael Eriksson, Margareta Sollenberg, and Håvard Strand
2002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9(5): 615-637.
- Glennie, Jonathan
2008 *The Trouble with Aid: Why Less Could Mean More for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
- Goldsmith, Arthur
2001 "Foreign Aid and Statehood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1): 123-148.
- Goodhand, Jonathan
2002 "Aiding Violence or Building Peac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id in Afghanist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5): 837-859.
- Grossman, Herschel
1992 "Foreign Aid and Insurrection," *Journal of Defence Economics* 3(4): 275-288.

- Harrigan, Jane and Chengang Wang
2011 "A New Approach to the Allocation of Aid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e USA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World Development* 39(8): 1281–1293.
- Hartzell, Caroline and Matthew Hoddie
2003 "Institutionalizing Peace: Power Sharing and Post-Civil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2): 318–332.
- Hegre, Håvard,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2001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1): 33–48.
- Heinrich, Tobias, Yoshiharu Kobayashi, and Leah Long
2018 "Voters Get What They Want (When They Pay Attention): Human Rights, Policy Benefits, and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1): 195–207.
- Heinrich, Tobias, Yoshiharu Kobayashi, and Timothy M. Peterson
2017 "Sanction Consequences and Citizen Support: A Survey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1(1): 98–106.
- Horowitz, Michael, Paul Poast, and Allan C. Stam
2017 "Domestic Signaling of Commitment Credibility: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8): 1682–1710.
- Jablonski, Ryan S.
2014 "How Aid Targets Votes: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Incentives on Foreign Aid Distribution," *World Politics* 66(2): 293–330.
- Jones, Sam and Finn Tarp
2016 "Does Foreign Aid Har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8(C): 266–281.
- Kim, Yong Jim
2017 "Rethinking Development Finance," Retrieved Oct. 9, 2019, from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speech/2017/04/11/speech-by-world-bank-group-president-jim-yong-kim-rethinking-development-finance>
- Kimura, Hidemi and Yasuyuki Todo
2010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38(4): 482–497.
- Kuperman, Alan J.
2008 "The Moral Haz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Lessons from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1): 49–80.
- Lebovic, James H. and Erik Voeten
2009 "The Cost of Sha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Aid in the Punishing of Human Rights Violato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6(1): 79–97.
- Licklider, Roy
1995 "The Consequences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s in Civil Wars, 1945–199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3): 681–690.
- Lof, Matthijs, Tseday Jemaneh Mekasha, and Finn Tarp
2015 "Aid and Income: Another Time-Series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69(C):

- 19-30.
- Magee, Christopher S. P. and Tansa George Massoud
2011 "Openness and Inter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1): 59-72.
- Mattes, Michaela
2012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6(4): 679-707.
- Meernik, James, Eric L. Krueger, and Steven C. Poe
1998 "Testing Models of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id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1): 63-85.
- Moyo, Dambisa
2009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Allen Lane.
- Mukherjee, Bumba
2006 "Why Political Power-Sharing Agreements Lead to Enduring Peaceful Resolution of Some Civil Wars, But Not Oth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2): 479-504.
- Narang, Neil
2015 "Assisting Uncertainty: How Humanitarian Aid Can Inadvertently Prolong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9(1): 184-195.
- Ndikumana, Léonce
2016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pp. 141-159 in Arnim Langer and Graham K. Brown (eds.), *Building Sustainable Peace: Timing and Sequencing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Peacebuil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elsen, Richard A., Michael G. Findley, Zachary S. Davis, Tara Candland, and Daniel L. Nielson
2011 "Foreign Aid Shocks as a Cause of Violent Armed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2): 219-232.
- Nunn, Nathan and Nancy Qian
2014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6): 1630-1666.
- OECD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2016 "Good Development Support in Fragile, at-Risk and Crisis Affected Contexts," 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 Retrieved Feb. 16, 2020, from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good-development-support-in-fragile-at-risk-and-crisis-affected-contexts_5jm0v3s71fs5-en
2020 "DAC List of ODA Recipients," Retrieved Feb. 16, 2020, from <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dards/daclist.htm>
- Paine, Jack
2016 "Rethinking the Conflict 'Resource Curse': How Oil Wealth Prevents Center-Seeking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4): 727-761.
- Peterson, Timothy M. and James M. Scott
2018 "The Democracy Aid Calculus: Regimes,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US Democracy Assistance, 1981-2009,"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4(2): 268-293.

- Pettersson, Therése and Kristin Eck
2018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7 and the Data Gener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5(4): 535–547.
- Rauchhaus, Robert W.
2009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Moral Hazards, Adverse Selection, and the Commitment Dilem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4): 871–884.
- Reinsberg, Bernhard
2015 "Foreign Aid Responses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75(C): 46–61.
- Reinsberg, Bernhard, Katharina Michaelowa, and Stephan Knack
2017 "Which Donors, Which Funds? Bilateral Donors' Choice of Multilateral Funds at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4): 767–802.
- Sachs, Jeffrey
2006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 Saideman, Stephen
2002 "Overlooking the Obvious: Bri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ck into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3): 63–86.
- Savun, Burcu and Daniel C. Tirone
2011 "Foreign Aid,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Conflict: How Does Democracy Aid Affect Civil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2): 233–246.
2012 "Exogenous Shocks, Foreign Aid, and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6(3): 363–393.
- Sawyer, Katherine,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and William Reed
2017 "The Role of External Support in Civil War Term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6): 1174–1202.
- Schudel, Carl Jan Willem
2008 "Corruption and Bilateral Aid: A Dyadic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4): 507–526.
- Selaya, Pablo and Eva Rytter Sunesen
2012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40(11): 2155–2176.
- Spaniel, William
2018 "Only Here to Help? Bargaining and the Perverse Incentiv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41): 14–22.
- Svensson, Jakob
2000 "Foreign Aid and Rent-See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2): 437–461.
- Teorell, Jan, Stefan Dahlberg, Sören Holmberg, Bo Rothstein, Natalia Alvarado Pachon, and Sofia Axelsson
2020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Standard Dataset*, Version Jan20.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Retrieved Jan. 21, 2020, from

<http://www.qog.pol.gu.se> doi: 10.18157/qogstdjan20

Tierney, Michael J., Daniel L. Nielson, Darren G. Hawkins, J. Timmons Roberts, Michael G. Findley, Ryan M. Powers, Bradley Parks, Sven E. Wilson, and Robert L. Hicks

2011 “More Dollars than Sense: Refining Our Knowledge of Development Finance Using AidData,” *World Development* 39(11): 1891-1906.

Uzonyi, Gary and Matthew Wells

2016 “Domestic Institutions, Leader Tenure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Peace Science* 33(3): 294-310.

Uzonyi, Gary and Toby Rider

2017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Aid: Rivalry and Domestic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3(2): 272-299.

Werker, Eric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lateral Foreign Ai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13-026, Retrieved Oct. 11, 2019, from <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9556366>

Wolford, Scott

2007 “The Turnover Trap: New Leaders,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 772-788.

Woo, Jungmoo

2017 “Oil Export, External Prewar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Conflict On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4(4): 513-526.

World Bank

2018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etrieved Feb. 16, 2020, from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A Signal of Aid: Adverse Effects on the Onset of Civil War

Szu-ning 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Civil war often occurs in poor countries that also attract foreign ai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oreign aid is capable of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civil war. Despite such aid being known as charity-based foreign polic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aid is delivered strategically. Since aid targets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it could be seen as a pro-government-biased intervention. I argue that it is the biased interfering signal that causes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changing costs of power-sharing and civil war between warring groups to discourage peace agre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1947 to 2017 with multilevel binary logit models, and find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the onset of civil war,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theory.

Key Words: foreign aid, civil war, commitment problems, power-sharing, signal